

话语分析范式与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何 伟¹ 魏 榕²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2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100083)

提 要 近年来,在人类文明及人文社会科学“生态转向”的背景下,生态话语分析应运而生。然而,目前学界对该话语分析范式的界定尚不清晰。本文通过回顾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等话语分析范式,比较出生态话语分析在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范围、研究步骤、理论基础等方面与其他范式均有不同。对于生态话语分析,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其理论基础的两个重要维度:生态哲学观以及功能取向的语言学理论。

关键词 话语分析范式 生态话语分析 理论基础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8.05.008

一、引 言

随着全球生态意识的加强,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该学科目前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Haugen 范式和 Halliday 范式。Haugen(1970、1972) 范式主要聚焦环境与语言的相互作用,从环境入手研究语言的生态;Halliday(1990) 范式主要关注语言对生态的作用,从语言入手研究生态问题。

国际学术期刊《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于 2014 年推出专辑讨论生态语言学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其中提到该学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展生态话语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EDA),也就是主要采取 Halliday 范式研究生态语言学,以揭示语言以及语言的使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Alexander & Stibbe(2014) 把 EDA 的历史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比如 Halliday(1990)、Gerbig(1993)、Harré et. al(1999)。不过大量的 EDA 研究最近几年才逐渐推出,特别是 EDA 的名称直到 2014 年才正式确立。目前,学界对 EDA 的内涵以及外延尚未达成一致认识。

最近几年,国外的 EDA 研究主要由英国(如 Stibbe 2015)、美国(如 Schelepppegrell 1996)、澳大利亚(如 Mühlhäusler 2003)和奥地利(如 Alexander 2017)等国家的学者展开。目前国内仅有少数学者从事 EDA 方面的研究,如辛志英、黄国文(2013)通过生态话语分析唤醒并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积极引导和培养人们正确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黄国文、赵蕊华(2017)通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汉语功能句法分析之计算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6YYB015)的研究成果;同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项目(编号:201706460082)的资助。

过探索生态话语有关问题,勾画出生态话语分析的目标、原则与方法;何伟、张瑞杰(2017)结合生态场所观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初步建构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何伟、魏榕(2017a、2017b)基于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以及外交理念,并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初步构建了国际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模式。然而这些研究较少涉及EDA系统性的特征,也没有明确指出其与其他话语分析范式的根本性差异,如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等。这些均不利于EDA的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EDA的重要文献,厘清其与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区别,总结出EDA的独特之处,以期推动EDA的进一步发展。

二、话语分析范式

从事话语分析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分析视角(韩礼德2011),如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和生态话语分析,这些分析视角在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范围、研究步骤及理论基础等方面各有不同。

1.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中(Fairclough 1995),而后得到学界的大力推广(如Fairclough 1989、1995、2012, van Dijk 2001、2014)。CDA的主要特点如下:

首先,CDA把社会分析的批评传统(the critical tradition of social analysis)引入了语言研究(Fairclough 2012),其批评性理论渊源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批评传统(苗兴伟、穆军芳2016)。马克思主义蕴涵丰富的批判思想,比如从哲学角度批判宗教,从政治角度批判宗教和哲学,从经济角度批判宗教、哲学和政治等(Korsch 1970)。与此类同,CDA研究语言的使用是如何体现并建构权势阶层的视角、价值观以及言谈方式,而这些或许不利于非权势阶层(O'Halloran 2011),目的是通过研究语言的使用,来揭示其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突显并批评社会不公等问题(Bloor & Bloor 2007)。因此,CDA具有“批判性”,是一种带有批评态度的话语分析(van Dijk 2001: 96),这是其不同于其他话语分析的主要特征。其次,为实现其批评性分析,CDA基于这样的假定——社会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通过语言使用来表达并建构(Wodak 2011)。具体而言,CDA将语言文本层次的分析与话语实践层次的解读以及与社会实践层次的诠释结合起来,进行层级之间的诠释。由此,CDA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而被看作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 1989)。换言之,CDA从语言的使用入手,聚焦语言的社会实践功能。再者,CDA的语言分析基础主要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上,尤其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江晓红2003),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性得到了所有CDA研究者的肯定(Young & Harrison 2004),比如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思想、语境思想、语域理论、社会符号理论与多层次系统观等都为CDA提供了可行的理论视角。

总之,CDA已经初步确定了其在人文社科中的地位,甚至被称作“学术正统”(an intellectual orthodoxy)(Billig 2002: 4)。不过它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其一,CDA因其“批判性”特征而将其分析范围局限于社会冲突性话语;其二,CDA虽然是一种带有态度的话语分析,但其缺乏话语的具体评判标准;其三,CDA融入了众多理论知识,但是在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

层次缺乏清晰且系统的分析框架。

2. 积极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其“批判性”特征使其过多关注社会负面现象而忽视了社会的积极变化,由此学界也将CDA描述为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病理性脱节”(a pathological disjunction)(Martin 2004: 186)。Breeze(2011)指出,话语分析不应只聚焦社会负面现象,还应关注反映社会积极变革的语言现象。为弥补CDA的不足,Martin(1999)主张开展“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PDA),其特点如下。

首先,“积极性”(positive)是PDA的主要特点。Martin(1999: 29)强调,“PDA关注话语如何建构希望与变化,与CDA的解构不公平与权势现象形成互补”。换言之,CDA重在解构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PDA重在建构社会中的美好现象。我们可以放弃斗争,通过重新分配权力来实现人民相互团结,从而赢得自己空间的目标(Martin 2004)。因此,PDA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来分析话语,其目标在于通过话语分析,朝着“和平语言学”(Peace Linguistics)的远大目标努力,最终建成一个宽松、和解、共处的人类社会(Martin 2006: 21)。其次,与CDA的社会冲突性话语类型相比,PDA研究的话语类型更加广泛,涉及政治话语、生态话语以及文化话语等多种类型(Bartlett 2012)。再者,与CDA类似,PDA的主要语言学理论基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此处需要指出,PDA视角下的话语分析涉及文本分析以及对分析所得语言特点的阐释,其阐释与CDA有所不同,PDA不区分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层次,主要结合情景语境以及文化语境进行。

然而,与CDA一样,PDA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二者的关注点都是社会中的权势,其研究范围都局限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黄国文、赵蕊华 2017),忽视了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因而并不适合作为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话语分析模式;其二,二者主要关注语言本身,即只注意语言系统和语义结构本身,忽视了诸如声音、图像、颜色、动漫等其他意义表现形式,局限了所分析话语的类型。

3. 多模态话语分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话语分析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语言以外的其他语义符号备受关注,西方兴起了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MDA),这种范式逐步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主要聚焦语言现象的话语分析模式不同,MDA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MDA是指在口头或书面交际中,交际符号的多样性分析,主要特征是聚焦符号系统中的“多模态”(Multimode),把包括语言在内的多种交际模态(如声音、图像、距离、空间、建筑、色彩等)作为话语形式,进行意义表达资源的分析和整合,是针对语言符号资源分析的一个有力补充。广义而言,MDA是揭示社会意义与其所有符号资源之间关系的一个强大分析工具(Kress 2012)。其次,要解读交际符号的多模态意义、特征以及功能,MDA需要掌握两个要领:一要弄清楚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二要确定不同符号资源之间的语法关系。这两个要领要求MDA必须具有一套系统的语言学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再者,系统功能语言学为MDA提供了理论基础,使之可以从文化、情景、话语意义、模态形式、语法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总之,MDA不仅能展现出语言系统在意义交换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且能揭示诸如图像、颜

色和音乐等其他符号系统在意义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人们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解读话语意义,进而帮助人们综合运用多种模态实现其交际目的(朱永生 2007)。与 CDA 和 PDA 相比,MDA 视角下的话语分析在步骤上涉及文本及其他符号所表达意义的解读,以及不同模态在意义表达上并协与互补关系的阐释,其阐释主要结合文化语境进行,较少深入探讨其他社会实践意义。

然而,MDA 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MDA 因对多种模态缺乏统一的分析标准而难以确定交际过程中的模态互动及互补关系。换言之,MDA 因其没有解读模态的统一标准,而很难判断哪些模态有价值,哪些模态没有价值。其二,MDA 的应用性尚须加强。MDA 是以实践为取向的理论,因而可以运用到如生态等社会问题的实践,然而,目前 MDA 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教学方面,较少涉及生态保护等其他社会实践。

4. 生态话语分析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加剧,生态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生态转向”中应运而生。目前生态语言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一是 Haugen 范式,关注语言的生态;二是 Halliday 范式,聚焦话语的生态取向分析(何伟、张瑞杰 2017)。换言之,话语的生态取向分析,即生态话语分析已成为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之一(Alexander & Stibbe 2014)。EDA 缘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 Halliday 的《意义表达的新方式: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一文,自此,很多学者尝试用不同的话语分析范式进行话语的生态取向研究,这些范式主要涉及 CDA、PDA 和 MDA。

Carvalho(2005)基于 CDA 研究了英国三家媒体话语,即《卫报》(*The Guardian*)、《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和《泰晤士报》(*The Times*)所体现的政治倾向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Stamou & Paraskevopoulos(2008)用批评话语分析框架研究了生态旅游话语,强调只有通过揭示消费主义本质才能将生态旅游的意识完全传递给生态旅游者;Alexander(2017)采用 CDA 探索环境话语,尝试为生态语言学提供经验性研究成果。最早采用 PDA 进行 EDA 研究的学者之一是 Goatly(2000),他用 PDA 对比分析了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和《泰晤士报》对自然的语言表征,发现前者比后者更加强调自然的施动角色意义;Alexander(2003)用 PDA 研究了环保运动者 Vandana Shiva 的演说,认为其演说为积极话语的有效模式。Maier(2011)采用 MDA 探索了媒体如 CNN 宣传企业绿化知识的方式;Chen(2016)探究了中国汽车广告图片是如何融入“自然”概念的。

虽然 CDA、PDA 和 MDA 等话语分析范式为话语的生态取向研究提供了借鉴,但是它们并不能作为 EDA 的最终范式。从本质上讲,EDA 指基于一定的生态哲学观,从语言学角度对话语进行生态取向的分析,目的是提倡对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发展有益性的话语,改善模糊性的话语,抵制破坏性的话语;话语包括口头的,也包括书面的,同时既包括有关环境的话语,也包括其他主题话语。具体地讲,EDA 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EDA 关注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生命可持续性关系,旨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增强人类的“生态责任感”,进而积极引导和培养人类对待人类同伴、对待其他物种以及环境的合理且正确的态度与方式。该宗旨不仅关系到人类与自然,而且关系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因此,较之聚焦解构权力话语的 CDA、建构和平话语的 PDA,以及解读多种交际符号意义的 MDA,EDA 具有更加长远、更加宏伟的目标。

其二,EDA 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即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根植于社会和文化

之中,具有系统性、个人化、文化性、可持续性、进化性等特征,它是生态话语分析者从事话语分析的生态性分析标准。因此,任何 EDA 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其生态哲学观,否则 EDA 的具体实践无从开展;相反,CDA、PDA 和 MDA 等话语分析范式没有明确的哲学指导思想,因而也就缺少一套系统化的评判标准。

其三,鉴于其宏伟目标与明确的指导思想,EDA 具有广泛的研究对象,囊括了 CDA、PDA 和 MDA 关注的所有话语类型,即包括 CDA 关注的“批评性话语”、PDA 关注的“积极性话语”、MDA 关注的“多模态话语”,同时包括可能促进人们保护或者破坏生态系统的所有话语,如健康杂志话语、消费者话语、广告话语、新古典主义话语、动物产品话语等,研究范围涵盖经济、社会、自然、政治、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而且这里的话语涉及语言以及其他意义资源。

其四,基于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渊源,EDA 不仅涉及语法和语篇的分析,还涉及词汇的研究,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的“词汇语法”相契合——这一点与其他重视语篇的话语分析范式有所不同。比如 Brigitte & Nelya (2009) 探讨了与“carbon”相关的复合词,以了解气候的变化在语言表征中的形式变化,并将其当作观察人类文化变化与适应环境危机的状态; Halliday (1990) 指出英语词汇语法系统对自然资源的表征存在不少问题,如把 air、water 和 soil 等不可再生资源的表征描述为不可数名词,这容易让人产生这些资源是不可枯竭的感觉。

其五,与其他话语分析范式不同,EDA 就话语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类,并就不同的话语类型提出了实践性建议。具体而言,在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EDA 将话语分成三大类型,包括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模糊性或中性话语(ambivalent discourse)和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Stibbe 2015)。其中有益性话语为遵循生态哲学观的话语,模糊性或中性话语为既不遵循也不违背生态哲学观的话语,破坏性话语为违背生态哲学观的话语。针对这三类话语,EDA 提出了话语使用与话语创作方面的实践性建议:提倡有益性话语,改善模糊性或中性话语,抵制破坏性话语。

其六,与其他话语分析范式相比,EDA 的分析步骤更加明确:首先确定生态价值观,即生态哲学观,抑或生态伦理;然后结合语言学理论对话语进行分析,区分话语的生态取向;最后提出话语使用及话语创作方面的建议,从而通过言语行为的生态化,指导人们的“生态行为”,促进生态系统的平衡。EDA 的分析步骤体现了“理论、分析与行动”三者的融合,说明了 EDA 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其七,生态语言学具有超学科性质(Finke 2017; 何伟、魏榕、Stibbe 2018),源于生态语言学的 EDA 同样具有超学科性质,超学科研究是新时代赋予科学研究的新要求,因此 EDA 较之其他话语分析范式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趋势。具有超学科特性的 EDA 比其他话语分析范式更具有开放性和融合性,从而能够集聚社会各界力量,一起推动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生命可持续性关系,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综上,EDA 在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范围、研究步骤等方面,均与 CDA、PDA 和 MDA 存在不同。下面,我们主要阐释 EDA 的理论基础。

三、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作为具有宏伟目标以及超学科性质的话语分析范式,EDA 对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关注,需要植根于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并且应以语言学理论为具体分析手段。

生态哲学观是 EDA 的重要指导思想(何伟、魏榕 2017a、2017b),是生态话语分析者的生态性评判标准,也是分析者用来追求生态和谐共生的系统性观点——既具有个人化特点,也具有社会化特点,其建构根植于社会和文化背景。每个 EDA 分析者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态哲学观,如 Stibbe(2015: 14) 针对相关生态话语提出了“生存”(Living)之生态哲学观,该观点重视价值(valuing living)、福祉(wellbeing)、现在和未来(now and the future)、关爱(care)、环境极限(environmental limits)、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复原性(resilience)等要素,旨在促进人们保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黄国文(2017)针对和谐话语提出了和谐话语之生态哲学观,该哲学观包含“以人为本”的基本假定和“三条原则”——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和制约原则,意在在中国语境下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因素相结合,既突出语言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又突出话语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和谐(黄国文、赵蕊华 2017);何伟、张瑞杰(2017)就自然生态话语提出了“和谐生态场所观”,该观点旨在帮助分析者判定话语属于保护型、模糊型或者破坏型,进而推广保护型话语的使用,遏制破坏型话语的发展,引导模糊型话语的转向,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何伟、魏榕(2017b)针对国际生态话语提出了“和而不同、互爱互利”的生态哲学观,该观点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文化以及外交理念,旨在维护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如上,目前 EDA 所持的生态哲学观有多种,从一定角度上可以讲,这主要是缘于生态话语种类以及所处语境的不同:有的侧重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生活话语(Stibbe 2015);有的关注中国语境下的多种话语(黄国文 2017);有的聚焦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何伟、张瑞杰 2017);有的涉及表征当今国际关系的话语(何伟、魏榕 2017b)。然而,本文认为既然任何一种生态哲学观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既定生态系统的良性平衡发展,而各生态子系统又构成一个巨大的相互促动和制约的系统网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众多生态哲学观中融合出一种普遍适用的生态哲学观。此生态哲学观既是个人化的,又是社会化的,同时也应该是国际化或全球化的。从目前的各种生态哲学观看,无论学者们聚焦哪个系统,主张哪种生态哲学观,一个系统总是由多种生态因子、要素组成的,一个系统的良性发展,均要求多元化和谐共生。由此,“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适性特点,适用于整个生态系统网络,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抑或自然、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等。

此处,我们需要指出,不仅 Halliday 范式下的生态话语分析需要生态哲学观的指导, Haugen 范式下的语言现象研究也需要生态哲学观的指导,比如潘世松(2012、2014、2017)提出了“语言生态伦理”概念。“语言生态伦理”主张语言生态的自律或应当存在,强调各语言生态位的和谐共生,该观点与本文主张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异曲同工。“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突显的是各生态系统以及生态因子之间的内在和谐共生关系,在其指导下的话语分析提倡的是语言的使用应维护各生态系统以及生态因子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语言生态伦理”突显的是语言作为生态位(即本文所提的生态因子)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在其指导下的语言现象研究提倡的是语言的自律性,也就是语言的发生、发展、传承等应具有自律性。唯此,语言生态位之间才有和谐共生,语言生态位之间的和谐共生才能促使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存在,也就是促使各生态系统及各生态因子之间的和谐共生。鉴于语言是体现和建构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媒介,无论是从语言的使用入手研究其对世界表征和建构上的作用,还是从语言生态位入手研究其自律性,进而着眼于生物多样性,二者均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从语言入手看世界,或以世界类比语言,二者体现的都是语言的建构主义观,二者的最终

目的都是维护世界各生态系统及生态因子的和谐共生,即生物的多样性。

Stibbe(2015)认为,EDA可以借鉴任何适用的语言学理论,比如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EDA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采纳,起始于Halliday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的发言《意义表达的新方法:挑战应用语言学》(1990)。发言中,Halliday指出了话语系统中的非生态现象,如英语中的增长主义、等级主义、代词系统的不完整性等问题。这些现象不利于地球的长期生存,鉴于此,Halliday号召语言学家肩负起用语言学研究应对生态问题的责任,呼吁语言学者关注语言在解决生态问题中应发挥的作用。

具体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理论及相关子系统理论(比如及物性理论、情态理论、评价理论等)都已被融入EDA实践。如Bednarek & Caple(2010)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分析了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环境报道;Stibbe(2015)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新古典主义经济话语的过程、参与者角色和情态等进行了功能性分析;赵蕊华(2016)通过分析银无须鳕生态评估报告,从语域、语义和词汇语法三个层面揭示其非人类动物身份,初步尝试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EDA之多层面分析;黄国文、陈旸(2017)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语域与语类和元功能理论,对自然诗歌进行了EDA研究,揭示了自然诗歌所蕴涵的生态意义;何伟、魏榕(2017a)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初步建构了国际生态话语的及物性分析模式;何伟、张瑞杰(2017)基于场所观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考察了人与场所生态因素的互动关系,初步建构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自然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杨阳(2018)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系统之子系统——态度系统对《卫报》(*The Guardian*)关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的10篇新闻报道进行了生态话语分析,旨在揭示西方主流媒体关于气候以及环境的意识形态,从而进一步证明评价理论对于EDA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并呼吁人们建立恰当的、有益于生存的生态哲学观。

另外,认知语言学也为生态语言学提供了理论基础(王馥芳2017),同样也就为EDA提供了理论借鉴。Stratford(1994)强调医学隐喻(medical metaphors)对于塑造生态环保意识有着重大作用;Stibbe(2015)尝试以Lakoff的框架(frame)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和“发展”(development)的认知语言学建构过程,对于其不同阶段的语言建构进行了生态性评价;Stibbe(2015)基于隐喻理论,对自然生态话语中的隐喻进行了历时性评价分析。

如上所述,从对语言学理论的借鉴方面,EDA与CDA、PDA和MDA有所不同,表现出了更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EDA认为,只要有益于话语生态取向的揭示,无论何种语言学理论均可以借鉴。不过,目前无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还是认知语言学理论,EDA对其借鉴尚不系统,还处于尝试阶段,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与融合。本文认为,EDA可以像MDA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而发展的“视觉语法”一样,构建自身的一套系统性分析理论,可以称作“生态语法”。不过,与视觉语法不同,生态语法应有两大而不是一大根基,即除了功能语言学理论外,须有生态哲学观的指导。有关生态哲学观对于EDA的重要性,上文已论及。有关EDA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本文强调,应是功能取向的,而不是形式取向的。形式取向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关注语言本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而功能取向的理论除了对语言系统本身进行描写外,还聚焦语言的使用;或者说,功能取向的理论凸显使用中的语言及其潜在的运作系统。总之,EDA以功能为取向,旨在通过揭示语言的潜在意义来分析人类生态意识,根据生态哲学观探讨该意识形态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从而唤起并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引导人们改善其语言行为以及相应的实际行动。

功能取向的 EDA 与词汇语法息息相关,因为词汇语法资源是语言意义驱动的源泉。就生态语法的构建,何伟、张瑞杰(2017)、何伟、魏榕(2017a)已初步描述了生态及物性系统、生态语气系统、生态情态系统、生态评价系统之态度子系统等,但研究尚不够系统和完善。首先,这些描述本身主要是增加了生态哲学观这一维度,对体现生态经验意义和人际意义的各系统本身的描述还不够深入,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够强;其次,这些描述对生态哲学观的表述也不尽一致;再者,这些系统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没有呈现出来,同时也缺乏对语篇功能方面的系统描写。为发展一个全面、系统、解释力强的生态语法,本文建议下一步的研究采纳能够促进各生态系统良性平衡发展的一个普适的生态哲学观,如上文提到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同时对体现人类经验的各语义系统网络及词汇语法形式,进行生态视角描写上的细化和延伸,并展现各系统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四、结 语

本文通过对比 EDA 与 CDA、PDA 和 MDA,从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步骤及理论基础等方面,阐述了 EDA 的特点。本文认为,CDA 和 PDA 中的 C(Critical)和 P(Positive)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是一种研究目的,MDA 中的 M(Multimodal)指的是研究对象,EDA 与 CDA 及 PDA 一样,其中的 E(Ecological)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是一种研究目的,因此 EDA 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环境话语等,而且可以是任何话语,其目的是通过分析,揭示话语的生态取向——生态有益性话语、生态模糊性或中性话语、生态破坏性话语。综上,与 CDA、PDA 和 MDA 相比,EDA 具有宏大的研究目的、系统性的指导思想、广泛的研究对象、明确的研究步骤,以及开放性的理论基础。这些特点源自其社会发展需要以及超学科性质。

本文主要是在 Halliday 范式下对生态话语分析范式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要明晰语言的使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还需要明确生态环境对语言使用的触发,也就是需要融合 Halliday 和 Haugen 两个范式的做法,既要从语言入手,研究生态问题,也要从生态环境入手,研究语言使用的运作机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揭示语言是如何为生态环境所制约,又是如何建构生态环境的。国内已有学者采取 Haugen 范式对相关领域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比如潘世松(2012、2014、2017)提出和发展了“语言生态伦理”概念,并据此对词典中增加的新词、新闻媒体中的措辞等进行了剖析,揭示了相关用语对“语言生态伦理”的遵守或违背,并提倡遵守“语言生态伦理”的语言使用以及各语言与各方言之间的和谐发展;祝克懿(2013)、祝克懿、殷祯岑(2014)、殷祯岑、祝克懿(2015)结合官场生态环境对官场话语运作机制进行了解读,为人们较为准确地理解官场话语提供了有效的策略。上述从 Haugen 范式入手的研究为我们分析话语的生态取向提供了缘起上的借鉴。鉴于此,今后的研究将努力融合两种范式,进一步完善生态话语分析范式,加强其社会实践,培养人们的生态问题意识,以改善其生态行为,从而达到以语言研究来承担重大社会责任的目的。

参考文献

- 韩礼德 2011 篇章、语篇、信息——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何伟、魏榕 2017a 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建构,《现代外语》第 5 期。
何伟、魏榕 2017b 国际生态话语的内涵及研究路向,《外语研究》第 5 期。

- 何伟、魏榕、Arran Stibbe 2018 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发展——阿伦·斯提布博士访谈录,《外语研究》第2期。
- 何伟、张瑞杰 2017 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构建,《中国外语》第5期。
- 黄国文 2017 论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黄国文、陈旻 2017 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以狄金森的《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为例,《外国语文》第4期。
- 黄国文、赵蕊华 2017 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现代外语》第5期。
- 江晓红 2003 批评话语分析的有效工具——功能语法,《学术交流》第7期。
- 马丁 2006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英语研究》第4期。
- 苗兴伟、穆军芳 2016 批评话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当代语言学》第4期。
- 潘世松 2012 异语文字符号夹杂现象的学科理据,《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潘世松 2014 语言生态伦理的性质及原则,《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潘世松 2017 语言生态伦理的自律价值,《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
- 王馥芳 2017 生态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相互借鉴,《中国外语》第5期。
- 辛志英、黄国文 2013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外语教学》第3期。
- 杨阳 2018 系统功能视角下新闻报道的生态话语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
- 殷祯岑、祝克懿 2015 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过程考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
- 赵蕊华 2016 系统功能视角下生态话语分析的多层面模式——以生态报告中银无须鲮身份构建为例,《中国外语》第5期。
- 祝克懿 2013 当下官场话语与生态文明建设,《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
- 祝克懿、殷祯岑 2014 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官场话语分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朱永生 2007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外语学刊》第5期。
- Alexander, R. J. 2003 Resisting imposed metaphors of value: Vandana Shiva's role in supporting Third World agriculture. *The Online Journal Metaphorik.de*, (4): 6-29.
- Alexander, R. J. 2017 Investigating texts abou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us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rpus linguistic techniques. In A. Fill and H. Penz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6-210.
- Alexander, R. J., & Stibbe, A. 2014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Language Sciences*, 41: 104-110.
- Bartlett, T. 2012 *Hybrid Voices and Collaborative Change: Contextualising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Bednarek, M., & Caple, H. 2010 Playing with environmental stories in the news good or bad practice?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4(1): 5-31.
- Billig, M.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rhetoric of critique. In G. Weiss and R. Wodak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London: Palgrave, 35-46.
- Bloor, M., & Bloor, T. 2007 *The Practic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rnold.
- Breeze, R. 2011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its critics. *Pragmatics*, 21(4): 493-525.
- Brigitte, N., & Nelya, K. 2009 Compounds, creativity and complexity i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the case of 'carbon indulgenc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9(3): 345-353.
- Carvalho, A. 2005 Representing the polit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1): 1-29.
- Chen, S. B. 2016 Selling the environment: green marketing discourse in China's automobile advertising. *Discourse, Context and Media*, 12: 11-19.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Fairclough ,N. 201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J. P. Gee & M. Handford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9-20.
- Finke ,P. 2017 Transdisciplinary linguistics: ecolinguistics as a pacemaker into a new scientific age. In A. Fill and H. Penz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406-419.
- Gerbig ,A. 1993 *The representation of agency and control in texts on the environment*. In R. J. Alexander ,J. C. Bang and J. Døør (eds.) *Papers for the Symposium 'Ecolinguistics. Problems ,Theories and Methods'* AILA 1993. Odense: Odense University ,61-73.
- Goatly ,A. 2000 *Critical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roductory Coursebook*. London: Routledge.
- Halliday ,M. A. K. 1990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6) : 7-16.
- Harré ,R. , Brockmeier ,J. , & Mühlhäusler ,P. 1999 *Greenspeak: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Thousand Oaks: Sage.
- Haugen ,E. 1970 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Talk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at Burg Wartenstein , Austria.
- Haugen ,E.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A. S. Dil (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25-339.
- Korsch ,K. 1970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Kress ,G. 2012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J. P. Gee and M. Handford(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5-50.
- Maier ,C. D. 2011 Communicating business greening and greenwashing in global media: 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CNN' s greenwashing vide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3(1-2) : 165-177.
- Martin ,J. R. 1999 Grace: the logogenesis of freedom. *Discourse Studies* ,1(1) : 29-56.
- Martin ,J. R. 2004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Revista C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 ,49: 179-200.
- Mühlhäusler ,P. 2003 *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 A Course in Ecolinguistics*. London: Battlebridge.
- O' Halloran ,K. L. 2011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J. Simpso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New York: Routledge ,445-459.
- Schleppegrell ,M. J. 1996 Abstraction and agency in middle schoo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J. C. Bang , J. Døør ,R. J. Alexander ,A. Fill and F. Verhagen (eds.) *Language and Ecology: Eco-Linguistics. Problems , Theories and Methods*. Odense: Odense University ,27-42.
- Stamou ,A. G. , & Paraskevopoulos ,S. 2008 Representing protection action in an ecotourism setting: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visitors' books at a Greek reserve.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5 (1) : 35-54.
- Stibbe ,A. 2015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tratford ,E. 1994 Disciplining the feminine , the home , and nature in three Australian public health histor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3) : 56-71.
- van Dijk ,T. A.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96-115.
- van Dijk ,T. A. 2014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Cambridge: CUP.
- Wodak ,R. 2011 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J. Zienkowski , J-O. Östman and J. Verschueren (eds.) *Discursive Pragma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50-70.

Young, L. & Harrison, C. 2004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New York: Continuum.

The Paradigm of Discourse Analyses a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e Wei & Wei Rong

Abstract: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A) has emerged at the “ecological tu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rts and humanities. However, the concept of EDA is not clearly defined yet. By reviewing the approaches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EDA differs from other approaches in terms of its origin, objectives, scope, procedure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urthermore, the paper makes a clarification of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DA — ecosophy and function-oriented linguistic theories.

Keywords: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沉痛悼念郑颐寿先生

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会长、中国辞章学研究会会长、福建修辞学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顾问、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学、档案学教研室主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郑颐寿先生，因病治疗无效，于2018年6月5日在福州逝世，享年82岁。编辑部同仁闻此噩耗，无不震惊痛悼。

郑颐寿先生一生致力于汉语修辞学、辞章学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治学严谨、著述丰厚。先后出版专著《比较修辞》《文章修改艺术》《辞章学概论》《辞章艺术示范》《辞章学导论》《辞章学新论》《辞章学发凡》《辞章体裁风格学》等；主编《新编修辞学》《修辞学研究》（第四、九辑）、《文学语言研究论文集》《言语艺术示范》《文艺修辞学》《辞章学论文集》《大学辞章学》等；组织编撰了《海峡两岸教授、博士辞章学丛书》和《海峡两岸汉语辞章学丛书》；主编了《中国文学语言艺术大辞典》《辞章学辞典》等四部词典。对话体学、风格学、辞章学的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颐寿先生的逝世，是本刊的重大损失，也是语言学界的一大损失。

郑颐寿先生安息！

本刊编辑部